

图说人文中国
主编 范子烨

历史 突围

图说春秋战国

闫志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说人文中国
主编 范子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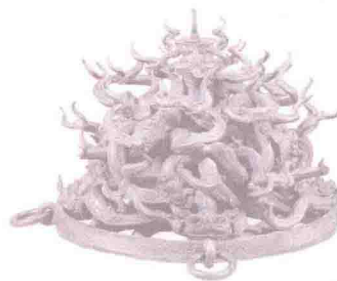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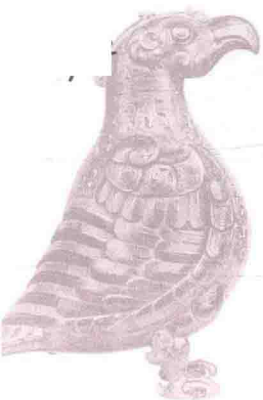
历史突围

图说春秋战国

闫志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突围:图说春秋战国/闫志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图说人文中国)

ISBN 978-7-100-12534-5

I.①历… II.①闫… III.①文化史—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图集 IV.①K225.0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52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历史突围——图说春秋战国

闫志 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534-5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8.00 元

目 录

导 读 / 001

政治篇

- 小试牛刀——郑国“小霸” / 010
征伐自诸侯出——大国争霸 / 012
陪臣执国命——权力的下移 / 015
短暂的和平——弭兵运动 / 021
九鼎震动——三家分晋 / 025
便国不法古——战国初期的变法运动 / 030
禅让的悲剧——子之之乱与燕齐战争 / 035
喧宾夺主——秦国的客卿与公族 / 039



军事篇

- 春秋战国军事制度的演变 / 044
城濮之战 / 047
鄢陵之战 / 050
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 / 052
燕齐之战 / 055
长平之战 / 057

经济篇

- 春秋战国时代的工官制度 / 062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铸造技术 / 066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 070
商业的发展与货币 / 072
春秋战国时期赋税及其改革 / 078





人物篇

- 骑士之殇——宋襄公 / 082
- 圣化的君主形象——魏文侯 / 084
- 过于喧嚣的寂寞——孔子 / 089
- 延陵季子——季札 / 094
- 国土无双——豫让 / 097
- 国家主义的滥觞——商鞅 / 099
- 一怒而诸侯惧——真实的苏秦 / 106
- 奇货可居——吕不韦相秦 / 109



思想文化篇

- 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 / 116
- 卜以决疑——占卜与权力 / 119
- 福地洞天——战国时代的民间信仰世界 / 123
- 长太息以掩涕——中国文学的发端 / 129
-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史学的发轫 / 132

民族篇

- 文明的冲突——中国北方边疆的形成 / 136
- 民族的记忆与改造——吴与蜀 / 140
- 筚路蓝缕——庄蹻入滇 / 144
- 用夏变夷——狄与中山 / 148

结 语 / 153

参考书目 / 154





导

读

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于犬戎之乱后，率众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北）迁都至成周（今河南洛阳），自此开启了史称“东周”的时代。

众所周知，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分封诸侯，各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史记录，如《孟子·离娄下》所云：“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各国国史多以“春秋”为名，如《墨子·明鬼下》有“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和“齐之《春秋》”等，《墨子》佚文还有“百国《春秋》”之说。其中以鲁国经孔子编订流传至今的《春秋》影响最大。鲁《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 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的大事。后世史家便把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的这段历史，称为“春秋”。

“战国”是“春秋”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最早出现“战国”一词的是《战国策》，其中《燕策一》云：“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又《秦策四》记顿弱对秦王政语：“山东战国有六。”^①西汉

① 《战国策》编定时间晚于《史记》，但内容来源当早于《史记》，因此笔者认为，《战国策》中出现的“战国”一词也当源自先秦语汇。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用“战国”一词来概括春秋之后的历史：“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所谓战国，是形容这一历史时期列国兼并战争规模宏大，超出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然而，对于战国时期的起始历来有不同的认识。

《史记·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前 475）作为战国起始，其标准是以《春秋经》截止年为上限。清人黄式三撰写的《周季编略》则以周贞定王元年（前 468）作为战国之始。清代学者马骥的《左传事纬》以公元前 453 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作为春秋时代结束标志。宋人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战国开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是年周天子正式册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从形式上承认了自春秋以来“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格局，使之合法化。

我们倾向于将公元前 403 年作为战国始年。原因有二：首先，虽然从春秋向战国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晋国三卿正式被册命为诸侯这一事件标志着春秋以来礼法社会的终结，连基本的形式都无法保留。所以司马迁在《周本纪》中用“九鼎震”来表示对这一事件的感触；其次，“三家分晋”与鲁国的“四分公室”、宋国的“戴氏代宋”等事件相比，虽然性质相同——都是公卿大臣削弱公室（国君）的权力，但影响却远远不同：韩、赵、魏三家成为战国初期最为重要的诸侯，所谓战国七雄占据其三，而且魏国和赵国先后一度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战国时代的起始年份虽有争议，但结束年份毫无疑问，应当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秦帝国。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变革时代，清代学者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这场变革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春秋战国堪称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政治与社会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仍保有较强的控制力。晋国曲沃庄伯一支屡侵公室，周王还能够召集虢、郑等国军力维持晋国朝纲。然而，时至周桓王即位后，郑庄公仰仗祖先保护平王东迁的功勋，向



周王室发起挑战，并造成小霸局面。自此王室权威一落千丈。

王室权威的衰落，导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爆发。首先是诸侯间的摩擦升级为战争。例如齐国和纪国、郑国和宋国等均有世仇，相互攻伐不已，甚至敌对双方拉拢其他敌对国家建立联盟互相对抗。其次是各国内部公室的权力斗争加剧，在没有外在权威的干涉下，国内强宗纷纷觊觎国君之位，西周以来建立的宗法体系逐渐失序、瓦解。如晋国的强宗曲沃一支，经过数代努力，终于取代了在都城翼城的大宗，成为晋国国君；卫国的庶公子州吁发动政变当上国君，但被大臣石碚设计擒杀。再次则是夷狄部族与诸夏之间的对抗白热化。彼时如晋国正在奋力与居于晋南的众狄作战，地处河南北部的卫国则遭到狄人入侵而社稷不保。

在诸夏失序、权力瓦解的情势下，霸主政治出现了。齐桓公横空出世，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俨然取代了周天子的权威，成为整合诸夏的力量。之后的晋文公霸业更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正式承认。晋国霸业不仅所及地域范围比齐桓公更广大，而且一直持续到春秋晚期。其余还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相继为霸，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霸主的勋业仅限于一隅，或及身而没，无法与齐、晋霸业相比。

究其实质，春秋的霸主政治是西周王政的延续。霸主虽偶有兼并，但以存续姬周分封体制、维持诸夏秩序、捍摒外夷为目的。其形式，则是霸主僭用天子专属的主持盟会特权，传达其影响力，约束诸侯。春秋晚期，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各自裹挟一些诸侯形成对峙，长时间难以分出高下。“两超”对峙格局终于引发了和平运动。弭兵大会之后，各自国家内部矛盾成为主流，强宗大室之间的争夺最终改变了春秋格局，新兴势力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战国时代。

经过春秋晚期的兼并，战国时代的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十几个。其中几个主要国家的君主都是经过篡弑得国，最为著名的就是赵、魏、韩三家分晋，齐国也发生了田氏代姜的“革命”。整个春秋时代，“陪臣执国命”的趋势愈演愈烈，权柄从天子转到诸侯，再由诸侯转到卿大夫，最后转向家臣手中。如果这一趋势不加



遏制，很有可能出现的是以采邑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欧洲中世纪式的封臣政治体系。然而，战国时代这些新兴国家的君主们，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在历史的歧路上调转了方向，一个个集权政府应运而生，为中国未来开辟了方向。

可以说，“变法”既是战国初期一场遍及各国的运动，也是战国时代贯穿始终的持续变革。作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有多个层面的展现：政治层面，将以分封为形式的封建制度转变成君主集权、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体制层面，将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世卿世禄”官制，转变成选贤与能、垂直管理的官僚体制；社会层面，将层层依附于领主贵族的民众，变成直接由政府控制的编户齐民，社会建立垂直流动机制；军事层面，将贵族式的、艺术化的争霸战争，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兼并战争。

在这二百年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为了加强集权，各国对旧贵族采取了抑制政策，以任命的官僚取代世袭贵族，更多的平民才俊进入体制。春秋时代贵族与平民（分处国、野的不同身份民众）承担不同的战争任务，后者主要负责后勤。战国时代为了扩大军力，平民被编入军队，承担主要作战任务。与付出的义务对等，这些参战的平民大多会得到政府授田，立下战功者甚至会得到爵级或物资的奖励。战争面前，贵族与平民实现了平等。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贵族领主与土地上的民众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国家直接控制人口的制度所取代。

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精华是士人阶层的崛起。士人本是西周以来贵族阶层中最低级的一等，在西周和春秋的官制内担任低级事务官员。随着人口的繁衍，嫡长子继承制度造成了大量的贵族支庶沦落为平民。春秋以来，贵族教育体系日渐瓦解，私人办学之风日盛。大量的平民通过学习经典知识，逐渐能够重新担任低级官吏（所谓“学而优则仕”）。士阶层被知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日渐为社会所承认和重视。战国时代，罢黜贵族特权、建立垂直官僚体制，需要大量知识者进入体制。士人阶层开始大显身手。从魏文侯礼贤到燕昭王纳士，从秦孝公下诏求贤到齐国设稷下学宫，士人成为各国统治阶级中至关重要的阶层。风云际会下，士人依靠自身丰硕的知识，通过著书立说为自身阶层执政摇旗呐喊、制造舆论。面



对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士人阶层预见性地提出许多平衡君主权力的方案；对于社会理想，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乌托邦理论。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士人阶层实现了哲学的内在突破，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特质，绵延至今不绝如缕。

技术与经济

伴随大变革时代而来的是技术的进步，而冶铁技术的突飞猛进最为耀眼。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冶铁技术起步很晚。商周时期出现了极少数铁质短兵器，且为高等级贵族使用。此时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铁制品，是间接承袭了西亚的锻铁技术的产物，冶金学上称之为“熟铁”，其延展性和硬度还很差。春秋时期，由于大型冶铁竖炉和鼓风设备——橐的使用，出现了块炼法冶铸生铁技术，这个发明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春秋战国之际，大量的铁质农具出现。湖南常德春秋楚墓中出土了铁锄；河北兴隆发现了为数甚多的战国铁范，专门用于制造农具。相比较于青铜器多用于兵器和礼器，铁器在此时期广泛用于农业器械，通过深翻土地、开垦荒地，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基本农具多为石器和骨角器。铁质农具出现，才在真正意义上使得农业产量产生飞跃。与此同时，农业耕作技术（包括施肥、轮作、除虫等）的成熟和普及，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包括各国政府实行的粮食储备和平糶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

商周时期手工业基本上为官营手工作坊所垄断。春秋战国社会，私营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手工业技术水平也有极大提高。春秋中期出现的失蜡法青铜铸造技术，可以造出镂空效果的细密纹饰。相比较于范铸法，失蜡法在塑造器形方面更进一步。此时还出现了嵌错纹饰的装饰技术，大量嵌错金、银、红铜、绿松石、珊瑚等材质的青铜器丰富了器物色彩。在青铜冶铸技术的带动下，商周以来出现的高温烧造的原始瓷此时大放异彩。原始瓷釉色呈青绿色和黄绿色，少数呈现古铜色。同时期江南地区的印文硬陶器也十分发达。印文硬陶主要出现在大都市遗址和贵族墓葬中，表明其地位



的崇高。原始瓷与硬陶，在造型上承袭了青铜器器形，同时开启了后世瓷器的先河。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的漆器，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迎来了第一次繁荣，尤其以南方楚国最为发达。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楚国版图内，出土了大批各式各样的漆器制品，包括屏风、床榻、几案、鸟形或鹿形鼓架、镇墓兽、棺槨等大型器具，还有如耳杯、盒、豆、壶、盘等小型器皿。其他如玉器、丝织品等手工业，均有长足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巨大进步，自然带来商业的繁荣。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弃官从商的大富翁陶朱公（范蠡），依靠贩卖食盐和珠宝致富的猗顿，经营四方、家累千金的端木赐（子贡），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大商人白圭，以及最为著名的“阳翟大贾”吕不韦等。他们交通南北，转运货物，积累大量财富，史称“富埒王侯”。随着天下财货的流通，各国都有商贾聚集的经济型城市。如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就是战国时著名的池盐业的中心，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和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都是当时冶铁业的都会，而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地处交通要冲，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人口涌向城市，促使重要都邑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布局也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大郭南北约四公里，内嵌周长五公里的小城。史称战国时临淄有户口七万，人口大约三十五万（按每户五口计算），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临淄城大郭的扩建应当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而城市布局上，宫殿区域在小城，大城西部为市区。小城南部的冶铁、制骨作坊可能属于官营手工业，同时大城北部也有很多冶铁和制骨作坊，有可能是私营手工业的遗迹。

民族的形成

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华夏民族的边界日益清晰。商周时期，早期国族以血缘和族姓对族群进行划分。如姬姓和姜姓联姻形成的部落同盟就是周族，子姓及一些姓氏族群组成的同盟就是商族。族群之间的边界往往不甚清晰。各族群在日常用器、丧葬礼俗等方面



的确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西周分封同姓、异姓诸侯至各地，周族与异族犬牙交错，地理界限与文化界限仍旧十分模糊。到了春秋早期，齐桓公始霸，提出尊王攘夷口号，强调“诸夏”的地理概念，联合“诸夏”共同对夷狄进行军事行动。晋文公更是对处于中原腹地的赤狄、白狄等部族进行征剿。孔子称赞齐桓公宰相管仲的功业，其中就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说法，这一观念其实是从文化上对华夏与夷狄进行区分。而春秋霸主们对夷狄部族的向外驱逐，则是从地理上确立华夏族群的边界。面对日益团结一致的“诸夏”，这些被排除到华夏边缘之外的“夷狄”，纷纷产生新的应对方式。白狄中的一支在今河北灵寿、平山等地，仿效中原诸侯建立中山国，一度十分强大。而更远的游牧民族，如匈奴，则建立草原帝国，以抗衡中原势力的崛起。也有如羌族者，选择西迁，同时适应新的地理环境，改变生计模式。总之，华夏民族的整合与形成，不仅对日后中原地区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而且在与周边族群互动的过程中，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民族结构也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影响。



政治篇





小试牛刀——郑国“小霸”

熟悉春秋史的人对“春秋五霸”都不陌生。但是，在五霸之前，郑庄公建立的霸业在专业史学领域之外却较少有人知。郑国霸业虽不及五霸的影响深远，但是作为霸政的开端，其意义亦不可忽视。

郑国始封在西周晚期。周宣王庶弟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建立郑国，成为第一代国君——桓公。周幽王封郑桓公为司徒，位列王朝公卿。由于时局混乱，郑桓公听从太史伯的建议，借地于河南的东虢、郕二国之间，向东转移郑国“资产”。幽王末年，犬戎灭周，桓公死难。即位的郑武公与晋侯一起，拥兵护卫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王朝。同时，武公顺势将东虢、郕消灭，在今天河南新郑建立新的郑国。

郑国有再造王朝的拥立之功，加之郑国地近洛邑，周平王出于感激，任命郑国国君世代为东周王朝卿士，独掌大权。武公死，子庄公即位。在平定了弟弟共叔段的叛乱后，庄公抓住了统一郑国的时机，发展壮大郑国国力。周平王晚年，鉴于郑国一家在朝中坐大，悄悄重用西虢国君，以分郑国之权。庄公迫使平王与郑国互相交换太子，以此换取彼此的信任，史称“周、郑交质”。根据周礼传统，地位对等的诸侯国之间可以交换人质作为制约双方的外交礼仪，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交换质子则是前所未有的。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崩，桓王即位，准备将大权赋予虢公。郑庄公立即采取报复性措施，于当年夏季派兵袭取温地之麦。同年秋天，郑国再取成周之禾。温、成周皆在王畿，郑庄公此举无异于公开向周天子挑衅。周、郑交恶由此开端。

挟取成周之禾的余威，郑庄公展开了他的霸业之旅。郑、宋世仇，宋国联合卫、陈、蔡联军伐郑，却一无所获。郑国反而于公元前718年率领王师伐宋，攻下宋国都城的外城才旋师而返。次年



郑国侵陈，大获资财。为了孤立宋国，郑庄公用交换土地的方式交好鲁国，与齐、鲁联合，对宋形成夹击之势。此后数年间，郑国屡败宋军，压服宋国使之不得伸展；同时败南燕、伐戎人，其国势如日中天。

“征伐不自天子出”的无礼行为继续恶化着郑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周桓王终于借故褫夺了郑庄公的卿士之职。深受刺激的庄公再不朝周。借此机会，桓王发动虢、卫、蔡、陈联军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联军与郑军在繻葛（今河南长葛）会战。针对联军阵型，郑庄公采纳子元的计策：使曼伯为“右拒”，攻击陈国军队；使祭足为“左拒”，攻击蔡、卫两军；以原繁和高渠弥护卫中军，攻击王师。由于蔡、卫、陈军力薄弱，很快被击溃，剩下王师独木难支，发生混乱。在郑国三军的合击下，王师大败。郑国将军祝聃于乱军中一箭射中桓王肩膀。冷静的郑庄公没有乘胜追击，反而派遣祭足夜见周王，并犒劳王师，给颜面丢尽的周天子一个台阶下。

繻葛战后次年，北戎侵齐，郑庄公遣太子忽率兵救齐。郑师大败戎军，俘获甚多。但是在分取战利品的问题上与鲁国产生矛盾。此后没有多久，郑国纠合齐、卫攻伐周的盟、向二邑，迫使周王放弃两城。公元前702年，郑国再次联合齐、卫讨伐鲁国，兵锋直至曲阜近郊。公元前701年，郑国与齐、卫、宋会盟，郑庄公的霸业达于极致。

繻葛之战奠定了郑国霸业。之前，周室虽然东迁，但王朝力量还足以镇服诸侯。晋国强宗曲沃庄伯联合郑、邢攻伐正宗晋侯，周王还能派遣王师平定。繻葛战后，周王室的光环尽落，诸侯心中再也不畏惧王室的力量。然而，郑庄公的霸业是建立在直接与周王室对抗基础上的。尽管获得辉煌胜利，但在宗法礼制尚未崩坏的春秋初期，无法获得诸侯的真正支持。郑国霸业不出今天河南省范围，影响所及仅宋、卫、陈、蔡诸国。这不仅与郑国国力相对仍然弱小有关，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接挑战传统秩序格局的策略，不具备政治号召力。后来齐桓公恰恰是针对郑国霸业缺陷，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路线，才获得成功。



征伐自诸侯出——大国争霸

继郑庄公“小霸”之后，郑国衰落，真正意义上的霸主出现在了东方。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公孙无知弑襄公，自立为君。次年，雍林人杀公孙无知，国君迟迟没有人选。此时，因避襄公之乱而分别逃奔鲁国和莒国的公子纠、公子小白，各自带领随从赶奔回国争夺君位。最后小白抢先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公子纠的谋臣管仲为相，励精图治，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对外尊王攘夷、兴灭继绝。这一整套政治纲领的实施，使得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

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在北杏召集宋、陈、蔡、邾等国会盟，共同商讨如何平定宋国内乱问题。据史传记载，当时遂国受到邀请而没有赴会，齐国便灭掉了遂国。这种带有强制意味的会盟，在西周时期属于周天子的专利。史称“周武有孟津之会，成有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周朝的盟会制度来源于周武王伐商时召集天下诸侯于孟津，誓师伐商，而武王之子成王在位时，在岐山之南（山南谓之阳）会盟诸侯进行大蒐之礼（即田猎）。天子主盟，是封建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处理封国关系、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手段。齐桓公主盟的北杏之盟尽管规模很小，但是却是诸侯行天子之礼、仿天子之制的开端，表明春秋时期霸主政治的开端。

此后的数十年间，齐桓公“九合诸侯”，以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葵丘即今河南兰考，一说在河北临漳）为霸业顶峰。此次大会，周天子派宰周公向齐桓公“赐胙”（赏赐天子祭祀祖先时用的祭肉），周天子通过这种最高礼遇承认齐国霸主的地位。这些会盟，有的是针对中原某国国内事务，有的则是联合诸侯一致对付戎狄诸族。齐桓公正是利用会盟的方式，实现了他团结诸夏、尊王攘夷的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同时这种“僭越”也招来了后世儒家对霸主政治的非议。

齐桓公死后，齐国陷于内乱，霸主地位一落千丈。继之而起的是晋国。晋国早在献公时（大略与齐桓公同时），就对山西东南部的戎狄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开拓了疆土。献公大杀群公